

迫问题着眼，而是放眼于更长远的考虑。

从传统企业转型谈振兴东北

邱泽奇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在讨论振兴东北时，有人指出东北的工业基础是一个有利条件。如有学者和官员指出，目前世界产业转移重点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而东北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此，有望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的确，东北曾经是工业化建设的重点，也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以沈阳为例，2001年，沈阳装备制造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本占74.9%，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的48.9%。但这些数据只能说明装备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不能像一些学者演绎的那样，说明装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换句话说，这些数据只能说明在东北的工业基础中，装备工业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如果考虑整个东北的情况，东北的工业基础除了装备工业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重化工和原材料工业如煤炭、石油等。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工业建设的早期阶段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并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这些旧有的工业产业的存在，并不足以说明东北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承接世界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说明东北具备了承接这类转移的能力，更不能说明这个转移会必然指向东北。事实上，如果我们简要地分析东北工业在最近20年的发展就会发现，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东北如果不进行工业再造、人力资源与管理水平的培育，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接现代制造业的转移，由此所构成的对振兴东北的憧憬就会变成一种美丽的想像。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装备工业发展的大趋势是在制造业中不断整合新兴的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装备工业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仍然极其有限，由此使得大多数东北工业的技术水平包括装备工业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就吉林而言，2002年405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有146户需要关闭破产，全省只有15%的工业企业工艺装备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60%以上属于70—80年代水平，15%属于50—6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这样的状态根本就无法适应现代制造业包括装备工业的国内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国际竞争了。

设备陈旧加上在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中没有有效地引入技术改造和管理改造的要素，使得近些年东北相当数量的大中型国有（装备制造）企业陆续陷入困境。众所周知，在制造工业中，管理技术和水平与企业的生产水平密切相关，而这两者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命周期。换句话说，陈旧的设备水平使得管理水平很难改善，加上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影响，由此造就了落伍的生产工艺和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技术的紧密结合，并最终把东北相当数量的大中型企业推向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末端。

不仅如此，还有技术改造的滞后东北工业人力资源的困境。东北大部分的大中型企业都建立在20世纪的50—70年代，尽管企业的工人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更换，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的生产困境使得这个过程基本终止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工人的主体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以前进入企业的，年龄在35—50之间（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大量的下岗

人员也正是这个年龄的)。在一个主流技术日新月异而自己企业的技术没有更新的年代里，这个年龄段的人学习技术的黄金机会早已被无情地剥夺了，进而使他们在人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变得无能为力，只能随着企业的不断倒闭，而进入历史的故事之中。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都有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阜新煤矿、吉林化工等企业的工人就是这样，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一些人甚至重新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重新扛起农具，变成了农民。

简而言之，一个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水平都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或更早时期的东北，或者说一个技术落后的传统企业占绝大多数的东北，正希望承接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年的技术水平、管理要求和人力资源要求的现代产业转移，这是不现实的。旧有的工业基础和失去学习机会的劳动力又如何能使东北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呢”？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制造业大转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珠江三角洲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完全得益于香港小型工业的扩散。珠江三角洲不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地方，香港人搬过来的工厂都是建在农田上的。这些工厂利用内地充分廉价的地租和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却把店面留在香港，也因此把绝大部分的利润留在了香港。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通过在自己的农田上建立工厂获取地租，迅速地成为了新型的“收租者”。这是一个双赢的安排，香港和珠江三角洲都乐见其成。

问题是，正是这样一种“双赢”的安排，埋下了日后发展危机的种子。众所周知，香港的小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并不能获得很高的工资。如此的工资水平对于可以从土地中轻松获得相对高额地租的农民而言，根本就没有吸引力，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很少介入转移进来的工业生产。换句话说，转移过来的工业变成了香港人和内地劳工的工业，与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无关。

十多年过去了，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稳定保持在两位数左右的增长，而珠江三角洲劳工的工资却增加不多。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珠江三角洲企业主的利润在不断增长；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出现了增长更快的地区。事实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但增长“平稳”，且没有能力不断提高工人收入。当然，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限。

珠江三角洲为什么没有吸引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呢？一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地价”的上升是根本的原因。而我认为，原因在于承接能力不够，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源的困境致使珠江三角洲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转移失去了吸引力。因为，如果说仅仅是地价的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20世纪90年代大量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台资企业可以通过转产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此，在我看来，更符合逻辑的原因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本地人没有积极地参与工业化的过程，也没接受过很好的技术教育，没有能力（如工业精神和技术训练）承担对技术水平有相当要求的职业。与此同时，由于相关制度（如当地的户籍制度。根据我的调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非本村人即使和本村人结婚，也要等到若干年之后，才可以把户口转入本村。）和“打工者”自身受教育程度的约束，“外地人”更是不可运用的人力资源。在一个没有管理人才和相关技术工人市场的地区，对技术性产业的转移无论如何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那些具有更高技术要求的企业不得不寻找更加合适的投资地区。

长江三角洲尤其是苏南的发展走了一条与珠江三角洲不同的路径，尽管在接受大城市技术辐射方面两者具有相似性。苏南的乡镇工业是在接受上海的技术支援，在社队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外资进入苏南之前，苏南工业的迅速发展依靠的基本上是本地的人力资源，从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到生产工人。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从社队企业历经乡镇企业到乡镇企业改制

后的乡镇工业，不仅培养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工人，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发展中培育了人们的工业精神。

当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际上一些具有技术量级的工业开始向中国转移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择了长江三角洲的一些靠近上海这个国际码头的苏南地区和杭州湾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外资进入苏南。以苏州的昆山为例，台湾有 1/9 的老板在昆山落户，昆山累计实有外资企业 2 000 多家，总投资额 130 多亿美元，注册资金 65 亿美元，其中投资超过 1 000 万美元的有 300 多家，超过 3 000 万美元的有 100 多家，其中台湾南亚集团投资的电子材料生产基地预期总投资 25 亿美元。概括起来说，在昆山，50% 以上的财政收入，60% 以上的利税，70% 以上的销售，80% 以上的投资，90% 以上的进出口都来源于利用外资。

同样，根据有关资料，2002 年，苏州市合同利用外资 101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48 亿美元，居同等规模城市第二，其中苏州工业园的 GDP 达到 252 亿元，财政收入达 32.6 亿元，占全市的 11% 强。建园以来，园区经济以年均近 50% 的速度增长，实现合同引资 135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57 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都超过了 3 000 万美元，10% 左右的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在园区有投资。[1]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类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谁想要什么，就能够很轻松地得到什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地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规则，那就是市场竞争。东北如果希望在这样的竞争中获胜并借此振兴东北，不是凭中央政府的几个项目和几百亿资金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在我看来，还必须在人力资源的培育上做文章。人们常说，人是世界的灵魂。但我更愿意说，人的能力才是世界的灵魂。

的确，东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把 10 年前汽车生产线上的工人不加培训地放在今天的“大众”系列生产线上，他是没有能力胜任的；管理也是同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的能力很容易过时，很容易失去效能。这就迫使人们不断地学习和接受培训。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始终处于过剩状态的国家而言，振兴东北的希望应该更多地放在有学习能力的人身上。中国有句俗语，“四十不学艺”，意思是说，人到四十的时候，思维基本定型，学习能力也开始衰退；因此，在一个可以用于学习的、资源异常紧缺的地区，我们更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

有鉴于此，我认为，在振兴东北的实践中，我们需要考虑世界产业转移的现实，但似乎不能把过多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工业基础，也不能寄希望于这些传统企业的转型，因为那样的企业大多数已经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已经没有能力来承接这样的转移。更加积极的实践应该是，运用东北工业基础中的工业精神和城市基础，让有学习能力的人口获得承接技术和产业转移的能力，通过他们的努力，再铸东北工业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商处，中新经贸合作关系现状及展望 [N]．亚洲时报，2003-04-12.

责任编辑：崔月琴